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诺德文本分析模式：跨学科翻译实践与策略研究

罗瑞方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

发布日期：2025年4月16日

摘要

本文基于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系统探讨克里斯蒂安·诺德文本分析模型在跨学科翻译实践中的适用性与策略选择机制。研究聚焦诺德模型的功能导向特征，结合文学、法律、医学、技术及游戏本地化等多领域案例，揭示其通过“文献型”与“工具型”策略的动态适配实现文本交际目标的核心逻辑。研究表明，文化专有项的传译需优先采用文献型策略，通过注释、术语表等副文本形式建立多层次文化解释体系；与此相对，科技与法律文本的译介则倾向于工具型策略，借助术语统一和功能等效原则确保信息有效传递。深入分析显示，译者的策略决策实为文内因素（如语言组织方式、体裁特征）与文外因素（如发起方目标、受众理解需求）互动驱动的必然结果。本文论证了诺德模型在跨学科场景中的系统性优势，同时也指出其在多模态协同、AI技术融合等新兴领域的拓展空间，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应用与创新提供实践参照。

关键词

功能主义；跨学科翻译；文本分析模型；文献型策略；工具型策略

Nord's Text Analysis Model from a 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A Study of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Strategic Approaches

Ruifang L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applicability and strategy selection mechanisms of Christiane Nord's text analysis model in multidisciplinary trans-

lation practices. Focusing on the function-oriented features of Nord's model, the study integrates case studies from literature, law, medicine, technology, and game localization to reveal its core logic in achieving textual communicative goals through the dynamic adaptation of "documentary" and "instrumental" strategies.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specific items requires a documentary strategy, constructing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networks via paratexts, while technical and legal texts rely on instrumental strategies to ensur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rough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and functional equivalence. Furthermor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herently results from the interplay of intratextual factors (e.g., linguistic structures, text types) and extratextual factors (e.g., sender's intention, reader's cognitive needs). This paper validates the systemic advantages of Nord's model in interdisciplinary contexts and highlights its potential for expansion in emerging fields such as multimodal coordination and AI technology integration, offering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Keywords

Functionalism;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Text Analysis Model; Documentary Strategy; Instrumental Strategy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不同语言文化间的深度互动，翻译实践逐渐从单纯的语言转换转变为跨领域协作的综合实践。在科技、法律、文学及医疗等场景中，翻译不仅承担着信息传递的基础功能，更成为促进知识互通、文明对话与国际协作的关键桥梁[1]。然而，领域差异导致的术语分歧、文化独特性的翻译困难，以及多样化交际需求的多重作用，使传统“形式对等”的翻译理念面临革新压力。在此背景下，功能主义翻译理论通过强调翻译行为的明确目的与交际功能[3]，为应对跨领域翻译挑战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

作为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发展，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的文本分析模型提出“功能—忠诚”原则（Function plus Loyalty），创建了一个兼顾文本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分析框架[2]。这一框架既系统考察源文本的构成要素（如词汇选择、句式特点、篇章组织），又深入分析翻译行为的社会文化背景（如原文创作意图、目标读者预期），从而为译者提供层次分明的决策支持体系[2]。例如，在少数民族文化文本翻译中，吴丽竹[1]通过文献型翻译策略（如音译加注），既保留了侗族文化的独特性，又实现了目标读者的可理解性；在法律文本翻译中，李金莲[10]采用静态对等策略，确保了荷兰《种子与种植材料法》术语的严谨性与效力的跨法系传递。克里斯蒂安·诺德文本分析模型的价值既是对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再发展，也因其多领域适用性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操作指引。从科技说明书到影视字幕，从医学论文到游戏本地化，其模型为不同学科翻译提供了适配策略选择的依据，成为破解“文化赤字”和“功能失调”的关键方法论[13]。

1.2 研究目的与问题

本研究以诺德文本分析模型在跨学科翻译场域的多维适用性为主要研究范围，旨在系统回应两大核心命题。第一，如何根据学科特点选择翻译策略？不同领域的文本功能差异显著，例如科技类文本（如渔业报告、药品说明书）以精准传递信息为首要目标，需通过简化术语、重组句式提升可读性；法律类文本（如国际种子法）强调条款的规范性与效力，需严格遵循术语对等[10]；针对文化类文本的传译实践，需要协调文化本真性维护与受众可接受度适配的双重诉求，典型如侗族散文、儒学典籍等文化载体的翻译策略选择[1][12]。例如，张子杨在药品说明书翻译中，通过标准化术语“过敏反应”（allergic reaction）和拆分复杂句，既保证医学严谨性，又避免理解障碍[6]。第二，文献型与工具型翻译的边界如何界定？跨学科场景中，两类策略常需混合使用。以游戏《原神》的德译为例，译者对“璃月”地区文化符号采用直译加注（如“傩舞”译为 Nuo Dance 并解释其驱邪仪式内涵），而对任务提示文本进行缩略改写以适配界面限制[7]。这种混合策略在影视字幕翻译中同样常见：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的英译压缩了长句以适应字幕时长，但保留“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诗句的直译，兼顾功能与意境[9]。

基于对既有实证案例的综合分析，本研究归纳出两个普遍规律：首先，不同学科领域的特性直接决定翻译策略的优先选择方向。如技术类文本（如专利说明书、操作手册）侧重工具型策略，以信息精确性为优先，李彤彤将英文被动句“The device is activated by pressure”转译为主动句“压力触发设备运行”，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11]；而文化类文本（如少数民族文学、儒学经典）倾向文献型策略，通过音译加注、仿译等手段保留文化内核[1]，如吴丽竹将侗族“月也”节直译为 Yueye Festival 并添加注释，既保留文化符号，又避免读者困惑[1]。其二，功能冲突时需动态取舍。当文本功能多元或矛盾时（如本地化需求与文化传播），译者需依据诺德模型动态调整策略[2]。例如法律文本翻译中，李金莲对荷兰《种子法》术语“plant variety rights”采用直译“植物品种权”，即放弃归化表达而采用文献型策略以维持法律效力[10]；初柏辰[7]在《原神》德译中，对“璃月”地区文化符号采用直译加注（文献型），而对任务提示文本进行缩略改写（工具型），兼顾文化深度与用户体验。

1.3 综述方法与框架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选取 2019 年至 2024 年间发表的多篇中英文学术成果作为研究对象，涵盖文学、法律、科技、医学及本地化等领域的翻译实践报告。所选文献涵盖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的双重维度，通过整合多领域实践证据，全面支撑诺德模型的跨领域适配性论证。研究设计遵循“理论探讨—实践检验—规律总结—未来展望”的递进式逻辑路径，确保论证体系的完整性。

在理论构建部分，研究系统解析诺德模型的核心理论要素，聚焦文本内部属性（如术语体系、句式组织方式）与外部语境参数（如作者意图、读者文化认知）的交互影响，并以“功能—忠诚”原则为理论基点，探索翻译策略的适应性调节机制。例如，吕芳[12]在儒学关键词英译中，通过对比不同译本揭示“仁”的文化不可译性，强调文外因素（如读者哲学认知差异）对翻译策略的深层影响[12]。

在实践应用层面，本研究通过分学科整合案例，系统阐释诺德模型的多场景适用规律。以科技文本翻译为例，张子杨[6]针对药品说明书专业术语的复杂特征，采用统一规范策略处理“剂量依赖性”（dose-dependent）等技术表述，使医学信息的跨语种交流效果得到有效提高[6]。在本地化领域，初柏辰[7]通过混合策略处理《原神》德译本：对“璃月”地名采用音译（Liyue）保留文化意象，而对任务提示文本进行缩略改写以适配游戏界面限制，实现文化传播与用户体验的双重目标[7]。

在策略总结部分，本研究提炼跨学科共性规律，例如技术文本普遍倾向工具型翻译以确保信息精确性，而文化类文本多依赖文献型翻译维护文化独特性。同时，研究特别关注混合策略的适用场景，如李华[8]在喷煤系统操作手册翻译中，既对专业术语（如“气化反应”gasification reaction）严格直译，又通过增译补充安全操作图示说明，兼顾规范性与可操作性[8]。

本研究结论部分系统剖析了理论模型的现存局限及拓展路径，指出既有成果主要聚焦于单模态文本（如书面文字）的个案分析，相较而言，多模态文本（如影视、游戏）的跨模态协同机制研究深度存在显著落差。例如，唐嘉欣[9]指出纪录片字幕需同时协调画面、语音与文字，诺德模型对此类复杂场景的指导力尚待深化。未来可探索人工智能辅助下的术语库动态适配技术，结合诺德理论提升多模态翻译效率。通过上述框架，本研究旨在为译者提供跨学科策略选择的系统性参考，同时推动功能主义理论在多元化、数字化翻译场景中的创新发展。

2. 诺德文本分析模式的理论基础

2.1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要义

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型植根于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体系，其核心理论基础在于超越传统“形式对等”的局限性，强调翻译作为目的明确的跨文化交际实践。相较于传统译论，功能主义主张翻译的价值不仅在于复原原文语义，更在于使译文在目标语境中实现特定功能目标——包括信息传递、行为规范与文化传播等多元维度[3]。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功能加忠诚”原则中。所谓“功能优先”，即翻译策略需围绕目标文本的核心功能展开。以法律翻译为例，李金莲在汉译荷兰《种子法》时，将“plant variety rights”直译为“植物品种权”而非意译，正是为了确保法律条款的规范性与效力对等，而非追求句式与原文完全一致[10]。类似地，科技文本翻译常需简化术语、重组句式以实现信息高效传递，如李彤彤将英文被动句“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转化为中文主动句“研究人员开展实验”，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11]。

“忠诚协调”原则要求译者在功能优先原则下，统筹考量原文意图与目标读者接受度之间的辩证关系[2]。例如，吴丽竹翻译侗族散文时，面对文化专有词“月也节”，直译为“Yueye Festival”可能造成读者困惑，但完全归化为“Harvest Festival”又会丢失文化独特性。最终她选择保留直译并添加注释：“侗族村寨间轮流做客的集体社交仪式”，既维护了文化真实性，又降低了理解门槛[1]。这种平衡在本地化翻译中尤为关键，如初柏辰处理《原神》德译本时，对“傩舞”采用音译“Nuo-Tanz”并解释其驱疫功能，而将任务提示文本“击败敌人”简化为“Gegner besiegen”（击败对手），兼顾文化深度与玩家操作效率[7]。功能主义还强调翻译行为的交际本质，即语言结构（文内因素）与社会文化语境（文外因素）必须动态协调[2]。以法律文本为例，词汇“shall”的翻译不限于语法时态表达，更承载着法律义务的设定功能。译者需综合考量发起方（立法机构）的权威属性与接收方（公民、企业）的合规诉求，将其译为“应当”而非“将”。例如李金莲[10]在荷兰《种子法》汉译中，通过“不得转让”的表述精准传递条款的强制效力[10]。这种互动关系构成了诺德理论的方法论基石。

2.2 文本分析框架的构成要素

诺德的文本分析体系将翻译决策要素划分为两大维度：文内因素主要考察文本语言特征，文外因素侧重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语境，二者协同构建翻译策略的系统化分析基础[2]。

文内因素强调语言结构对翻译的直接影响。具体而言，在词汇层面的处理中，专业术语的精准度直接影响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张子杨在翻译药品说明书时，将“hypersensitivity”统一译为“过敏反应”而非“超敏反应”，既符合医学规范，又避免患者因术语歧义产生误解[6]。句法层面，英语长难句在中文语境中常需拆解重组。刘若琦处理渔业报告时，将原文“The decline in fish stocks, caused by overfishing and climate change, requires immediate action”拆分为“过度捕捞与气候变化导致鱼类资源锐减，亟需采取行动”，通过短句提升信息密度与可读性[4]。篇章功能则要求译文与原文目标一致，彭潍坊在招标文件翻译中保留条款编号与结构化目录，确保商务文本的规范性与法律效力[5]。文外因素关注翻译行为的社会文化维度。

首先,发送者意图决定译文的价值导向。例如吕芳翻译儒学关键词“仁”时,拒绝简单对应为“benevolence”,而是通过注释阐释其“克己复礼”的伦理内涵,以传递孔子“爱人”的哲学思想[12]。其次,接收者期待影响策略选择。初柏辰在《原神》德译本地化中,发现德语玩家偏好简洁操作指引,因此将任务描述“击败所有来袭敌人”简化为“Gegner besiegen”(击败对手),同时保留“璃月”地名的音译“Liyue”维护文化特色[7]。最后,媒介与情境约束表现形式。唐嘉欣翻译纪录片字幕时,将“书海泛舟”压缩为“navigate the sea of books”,舍弃直译“sail in an ocean of books”,既保留诗意又适配字幕的时空限制[9]。文内与文外因素并非孤立存在。例如法律文本中,“shall”的翻译需兼顾语言规范(文内)与法律效力(文外):李金莲将荷兰《种子法》“shall not be transferred”译为“不得转让”,既符合中文法律术语习惯,又体现条款的强制约束力[10]。

2.3 翻译策略的双重维度

诺德基于文本分析体系提出的两种翻译策略,并非绝对对立选项,而是依据文本功能需求动态调整的连续统一体。文献型翻译以文化保留为核心目标,适用于需凸显源语特色的场景。例如殷可翻译日本教育史术语“学制”时,采用音译“gakusei”并加注说明其特指明治维新时期“全民基础教育体系的建立”,既保留术语的日语文化属性,又通过注释弥补读者历史认知差异[17]。此类翻译常通过直译、音译结合注释或再现原文修辞手法实现。例如诗歌翻译中保留原作的韵律结构,或模仿俳句“五-七-五”音节模式,虽可能影响译文的流畅性,但能有效保留独特的文学形式美感[1,12]。工具型翻译则注重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实际功能实现,多见于实用类文本。李华在喷煤系统操作手册翻译中,将“ignition temperature”译为“点火温度”而非字面对应的“点燃温度”,因为后者易被误解为“点燃动作的时间点”,而“点火温度”精准对应技术参数定义[8]。此类翻译通过术语规范化、句式重构(如英语被动语态转为中文主动表达[11])或功能适应性调整(如法律条款效力匹配[10])达成信息高效传递的目标。

实际翻译中,两类策略常需混合使用。以新闻翻译为例,周学梅处理政策术语“供给侧改革”时,直译为“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可能令国际读者困惑,完全意译为“economic optimization policy”又会丧失术语权威性。最终她采用折中方案:保留直译并添加括号解释“(a policy to optimize economic structure)”,既满足专业文本的严谨性,又服务大众读者的理解需求[15]。类似地,安昕苒在社科教材翻译实践中,采用“批判性思维”音译并加解释义为“逻辑分析与反思能力”,兼顾学术严谨性与跨文化接受度[21]。

3. 学科翻译实践中的诺德模型应用

3.1 文学与文化翻译

诺德模型在文学与文化翻译中,通过协调文化真实性与功能适用性,有效应对文化专有项的传播挑战。以侗族文化散文翻译为例,吴丽竹在翻译《三省坡密码》时,面临大量缺乏英语对应表达的文化负载词,如“月也节”“鼓楼对歌”等。若直接意译为“Festival of Visiting”(拜访节)或“Singing in the Tower”(塔楼对唱),虽能传递字面含义,却会消解侗族文化的独特性。因此,她选择文献型翻译策略,将“月也节”音译为“Yueye Festival”,并在脚注中详细解释:“侗族传统社交活动,村寨间轮流举办宴会、对歌、讲款(盟誓),旨在加强族群凝聚力。”同时,对“鼓楼对歌”这一场景,她补充注释:“鼓楼是侗族议事、庆典的中心建筑,对歌以多声部大歌为形式,歌词即兴创作,体现侗族口头文学的智慧”[1]。通过音译结合注释的方法,既维护了文化符号的独特性,又借助背景说明降低读者的理解障碍。类似地,儒学关键词翻译需兼顾哲学深度与读者接受度。吕芳在《孔子诗论》英译中,发现“仁”若简单译为“benevolence”(仁慈),会丢失其“克己复礼”“推己及人”的复杂伦理内涵。她采用异化策略,音译为“Ren”并标注

“humaneness”，同时在注释中对比孟子“恻隐之心”与孔子“仁者爱人”的差异，解释“仁”既是道德准则，也是社会实践。此外，她在例句翻译中调整句式结构以适应英语逻辑：将“仁者不忧”的直译“The Ren-person does not worry”调整为“A humane person is free from anxiety”，既保留核心概念，又通过归化策略提升可读性[12]。这一案例表明，文化翻译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通过动态平衡实现“功能加忠诚”——既传递文化独特性，又满足目标语读者的理解需求。

两种案例共同印证，文学与文化翻译需灵活运用诺德模型：文献型策略（如音译、注释）维护文化身份[1,12]，工具型策略（如句式调整、术语归化）确保功能实现[6,8]。译者需要在文本内部特征（如特殊词汇、复杂句法）与外部条件（如读者文化认知、传播渠道特性），即文内因素和文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中[2,12]，寻求最佳平衡。

3.2 科技与法律翻译

科技与法律文本对信息准确性和规范性的严格要求，促使工具型翻译成为核心策略。以机械专利翻译为例，李彤彤在汉译英文说明书时，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术语的专业性与一致性，二是英文长难句的中文可读性。例如原文术语“torsional vibration damper”若直译为“扭转振动阻尼器”，虽字面准确，但不符合国内机械行业习惯。她查阅《机械工程术语标准》发现，该装置在中文技术文献中通称为“扭振减震器”，因此采用标准化译法[11]。这一选择不仅避免表述冗长，还确保工程师快速理解其功能——通过抑制旋转部件的振动（而非一般性减震）提升设备寿命。从句子结构角度看，英文专利文本常因多重嵌套导致语句冗长。例如原文“The device, which comprises a housing and a rotor assembly,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ability to reduce harmonic oscillations during high-speed operation.”包含 36 个单词，若直译为“该装置，其包含一个外壳和一个转子组件，其特征在于其在高转速运行期间减少谐波振荡的能力”，中文读者易迷失主次信息。李彤彤将其拆分为两句：“该装置包含外壳与转子组件，其特点在于能够减少高速运转时的谐波振荡。”通过删除冗余从句（which）并重组语序，使核心信息（功能）与辅助信息（结构）层次分明，更符合中文技术文本的简明风格[11]。法律翻译对术语对等要求更为严苛。李金莲在汉译荷兰《种子法》时，发现“shall not be transferred”的译法直接影响条款效力。若译为“不应转让”，仅表达建议性限制；而“不得转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明确用于设定禁止性义务，具有法律强制性。例如该法第 15 条“国家秘密不得擅自公开”即用“不得”强化约束。因此，她采用“不得转让”的译法，保障法律效力在不同法律体系间的准确传递[10]。同理，术语“plant variety rights”直译为“植物品种权”而非意译，因其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中已有权威定义，直接沿用可规避司法实践中的术语歧义[10]。

这类案例凸显了诺德模型“功能优先”原则的实践价值[2]，即科技翻译以信息高效传递为核心[11]，法律翻译以效力对等为基准[10]，译者需通过术语规范、句式重组等工具型策略，使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独立发挥功能。

3.3 视听与本地化翻译

影视翻译与本地化需处理多种元素协同与界面适配问题，策略选择更具挑战性。以纪录片字幕翻译为例，唐嘉欣在翻译《但是，还有书籍》时，面临画面、语音与文字的多重约束。片中提到“书海泛舟”这一诗意表述，若直译为“sail in an ocean of books”，虽忠实原文，但占用 13 个字符且需 2.5 秒阅读，超过每帧字幕仅 2 秒的时效限制。她最终压缩为“navigate the sea of books”（9 个字符），通过保留“sea”的隐喻意象传递“浩瀚书海”的意境，同时缩短阅读时间至 1.8 秒，使其与画面中翻书的动作节奏同步[9]。此外，片中术语“腰封”指书籍封面折页的广告文案，德文无对应词汇，她译为“cover flap”并在画面切入书籍特写时添加括号解释“promotional text on folded cover”，既避免干扰观看，又辅助理解[9]。

游戏本地化则需在文化还原与操作流畅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初柏辰在《原神》德译中，发现“璃月”地区的文化符号“傩面”若直译为“ritual mask”（仪式面具），会丢失其“驱邪纳福”的特定文化功能。他采用文献型策略，音译为“Nuo-Maske”并在游戏百科中注释：“源自中国傩戏，表演者佩戴以驱逐疫鬼，象征祈福避灾”[7]。但对于任务提示文本“收集 3 个霓裳花”，德语界面按钮仅允许显示 8 个字符，原译“Sammler 3 Nischang-Blumen”超出限制，因此简化为“Sammler 3 Blumen”（收集 3 朵花），虽舍弃“霓裳”的文化意象（原指仙衣），但确保玩家快速理解任务目标[7]。类似地，技能名称“天动万象”译为“Himmelsdominanz”（天空支配），虽弱化中文的宏大叙事风格，但更契合德语玩家对战斗技能的直白认知[7]。

这类案例表明，视听与本地化翻译需动态混合文献型与工具型策略：文化符号的深度保留（如傩面注释）服务于世界观构建，而界面文本的简化适配（如任务提示）则优先用户体验。诺德模型的适应性在此类复杂场景中展现出显著优势。

4. 跨学科翻译策略的规律与挑战

4.1 策略选择规律

不同学科文本的功能定位直接影响翻译策略的优先顺序，文本功能越明确，策略选择的指向性越强。例如信息型文本（科技、新闻）以工具型翻译为主，注重功能等效性。以机械专利翻译为例，李彤彤在汉译“self-lubricating bearing”时，发现直译为“自我润滑轴承”可能引发歧义——英语中“self-lubricating”指材料本身含润滑成分（如石墨），而中文读者可能误以为“装置可自动添加润滑油”。她查阅《机械设计术语国家标准》（GB/T 3935.1-2023）[17]，确认行业通行译法为“自润滑轴承”，这一标准化术语直接关联技术原理，确保工程师精准理解“无需外部润滑”的核心功能[11]。新闻翻译同样遵循功能优先原则，周学梅处理政策术语“供给侧改革”时，若直译为“supply-side reform”可能被国际读者误读为“增加商品供给”，因此，她译为“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首次出现时添加括号说明“（a policy to optimize economic structure by reducing ineffective production）”，既保留术语的政治准确性，又通过解释性补充降低读者认知成本[15]。

文化专有型文本（文学、历史）则以文献型策略为核心，在保留文化特质的同时兼顾可读性。例如吴丽竹翻译侗族散文时，面临“鼓楼对歌”这一文化专有项。“鼓楼”不仅是侗族建筑，更是社区议事、节庆、传承口述历史的中心；而“对歌”特指多声部合唱“大歌”，歌词即兴创作、无文字记录，若归化为“community singing”（社区合唱），会抹杀其文化独特性；若直译为“Gulou Duige”不加注释，读者又无法理解其社会功能。因此，她音译为“Gulou Duige”并添加脚注：“侗族特有的集体歌唱形式，在鼓楼中以多声部即兴演唱，内容涵盖神话、伦理与日常经验，2009 年被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1]。此类“深度翻译”方法通过补充材料（如注释、附录、术语表）扩大文化解释的覆盖范围。

综合类文本（法律、游戏）需采用组合策略满足多样化需求。初柏辰在《原神》德语本地化研究中发现，“傩舞”符号的翻译涉及多层文化内涵：其面具设计源于中国傩戏传统，象征驱邪纳福的仪式功能。若直译为“Ritual Dance”（仪式舞蹈），德语玩家无法关联其特定文化内涵；若意译为“Exorzismus-Tanz”（驱魔舞），则偏离原意。他最终音译为“Nuo-Tanz”，并在游戏内置百科“旅行者手册”中解释：“源自中国古代傩戏，表演者佩戴狰狞面具以驱逐疫鬼，现为‘璃月’地区传统庆典项目”[7]（文献型策略）。而对于任务提示“击败 20 名敌人”，德语界面按钮仅允许显示 12 个字符，原译“Besiege 20 Gegner”超出限制，因此简化为“20 Gegner besiegen”，牺牲语法完整性（省略动词变位）以优先操作指引的清晰性[7]（工具型策略）。法律文本的混合性同样显著：李金莲将荷兰《种子法》“shall not be transferred”译为“不得转让”，

因中文法律中“不得”具有强制禁止效力；但她在脚注中说明：“荷兰法中的‘transfer’包括物权与知识产权让渡，而中国《民法典》第 240 条‘不得转让’仅限物权范畴，司法实践中需结合具体条款解释”[10]。

4.2 实践中遇到的挑战

第一，文化专有项的不可译性。文化专有型文本的翻译挑战源于其语义的深度关联性与多层解释空间。以儒家核心理念“仁”为例，其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涵盖三重维度：伦理角度的“关爱他人”（《论语·颜渊》）、行为规范的“自我约束与礼制遵循”（《论语·颜渊》），以及政治治理的“德政实践”（《论语·为政》）。吕芳[12]指出，英语中“benevolence”（仁慈）仅能传达“关爱他人”的表层伦理意义，却无法涵盖“仁”的自我约束与社会治理功能。若采用音译“Ren”，虽保留术语独特性，但英语读者可能将其误解为普通名词而非哲学概念。为此，吕芳在《孔子诗论》英译中采用“Ren (humaneness)”的译法，并通过脚注补充：“‘仁’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既指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也包含通过礼仪实践实现社会和谐的政治理念”[12]。即便如此，注释仍难以完全弥合文化认知鸿沟——例如英语读者可能将“克己复礼”的注释“self-discipline and ritual propriety”理解为个人修养，而忽略其“通过规范行为构建社会秩序”的深层政治意涵。此类翻译难点本质上是文化体系差异的具象化呈现，要求译者系统考量“文化真实性维护”与“目标受众接受度”的动态关系。

第二，多模态文本的复杂性。多模态文本翻译需实现文字、图像、声音等要素的协同处理，这对策略设计形成双向制约。以游戏《原神》德译为例，初柏辰[7]在本地化“傩面”道具时，过场动画中角色佩戴傩面舞蹈时，德语配音台词需匹配动作节奏，避免字幕与画面脱节，确保文本层面、视觉层面和叙事层面统一。若其中任一维度失调，玩家便可能产生认知断裂——例如若将傩面译为“Teufelsmaske”（魔鬼面具），虽符合外形描述，却会误导玩家将其关联至欧洲恶魔文化，破坏“璃月”地区（以中国为原型）的文化一致性。纪录片翻译同样受多模态制约，唐嘉欣[9]处理“书海泛舟”时，原译“sail in an ocean of books”虽诗意，但需 2.5 秒阅读，超过每帧字幕 2 秒的时限。她压缩为“navigate the sea of books”，并确保字幕出现时画面切至书籍堆叠的特写镜头，利用视觉隐喻弥补文字简化带来的意象损失。

第三，法律效力的静态对等局限。法律术语的跨法系匹配存在系统性障碍。李金莲[10]在汉译荷兰《种子法》时发现，“exclusive right”直译为“专有权”看似对等，但两国法律体系对该术语的界定存在本质差异：首先在荷兰法中，该权利涵盖植物新品种的繁殖、销售、进出口及许可他人使用的全链条控制，兼具物权与知识产权属性；根据中国《民法典》第 240 条[16]，“专有权”在法律语境中明确界定为“所有权人对动产/不动产的排他性支配权利”，其外延不包含知识产权实施权[10]。这种差异导致荷兰条款“The holder of an exclusive right may grant licenses to third parties”若直译为“专有权人可向第三方授予许可”，可能被中国法院误读为“物权人可许可他人使用其动产/不动产”，而荷兰原文实际指“品种权人可授权他人繁殖销售”。尽管李金莲通过脚注说明差异，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可能忽略注释直接依据字面释义裁判。这种形式对应的局限性揭示了法律翻译的结构矛盾，即术语表层对应未必能保证法律效力的实质等效。

4.3 实践启示

针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障碍，可通过多维度补充材料（注释、图表、背景说明）构建解释性框架，有效减少跨文化理解偏差，实现文化内涵的深层次传递。以侗族散文翻译为例，吴丽竹在译本末尾增设“侗族文化术语表”，其中“月也节”条目不仅解释为“村寨间轮流做客的社交活动”，还补充其社会功能：“通过集体宴饮、对歌、讲款（盟誓）巩固族群认同，是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同时，她对“讲款”添加跨页脚注：“侗族口传法典，以押韵歌词形式规定村寨权利义务，具有法律与道德双重约束力”[1]。这种分层注释策略，既避免正文冗长，又为不同认知需求的读者（如文化研究者与普通读者）提供差异

化阐释路径。另外可通过数字化技术为深度翻译提供创新路径。初柏辰在《原神》德译中，将文化符号“傩面”的注释嵌入游戏交互系统：当玩家首次拾取道具“Nuo-Maske”时，界面弹出简注“驱邪面具（点击查看详情）”；用户点击后可访问“旅行者手册”的扩展词条，通过 3D 模型动态演示与历史演变视频，详细解析傩戏从“周代防疫仪式”到《原神》“璃月庆典”的虚构化重构逻辑[7]。这种动态注释设计，既维持游戏节奏流畅，又满足玩家对文化深度的探索需求。

提升译者的动态决策能力是非常必要的。跨学科翻译要求译者具备双重素养：既需掌握专业知识体系，又能运用诺德模型进行策略的动态适配[2]。以法律翻译为例，李金莲在荷兰《种子法》汉译中，面对“exclusive right”的跨法系差异，遵循三步决策流程：1）功能识别：确定条款核心功能为“品种权人排他性控制”；2）效力对等：选择中文法律效力最匹配的“专利权”；3）风险管控：添加脚注预警“中国法下该术语不包含知识产权许可”[10]。这种双重决策机制，既保障文本的法律效力，又通过补充说明材料警示司法实务中的释义不确定性。科技翻译也同样要求译者能够动态调整策略。李彤彤处理专利长难句时，采用“信息权重分析法”，首先保留主干信息“The device comprises a housing and a rotor assembly”（该装置包含外壳与转子组件），然后把次要信息进行拆分，“which are made of heat-resistant alloy”（采用耐热合金制造）移至后置定语，最后把冗余修饰“as described in prior research”（如先前研究所述）删除[11]。通过信息层级划分，她在术语统一处理（工具型策略）与功能优化调整（受众适应性）之间取得动态平衡。这类实践表明，译者的动态决策能力本质上是对文内因素（语言结构）与文外因素（社会功能）的协同分析能力，其培养需结合案例训练与理论反思。

5. 结论与展望

5.1 主要研究发现

本研究基于功能主义理论框架解析诺德文本分析体系，阐明其在跨领域翻译实践中的多维价值。第一，诺德模型在跨学科实践中展现出显著适配性，系统性框架提供策略选择的逻辑基础。例如法律翻译中，李金莲通过“不得转让”实现效力对等（工具型策略），同时以脚注补充法系差异（文献型策略），证明文内因素（术语规范性）与文外因素（司法实践）的协同分析机制[10]。游戏本地化领域，初柏辰对“傩面”的文化注释与任务文本简化，则凸显模型在多模态场景下的动态平衡能力[7]。然而，不同领域的特殊性要求翻译策略要相应定制，如科技文本的术语标准化[11]与文学文本的深度翻译[1]需差异化应用模型参数。第二，文献型与工具型策略的边界逐渐模糊，混合使用成为新常态，灵活性特征适应多元场景的功能需求。周学梅在新闻文本翻译中，对“供给侧改革”采用直译结合注释说明的策略，既维护术语的专业属性（文献导向），又满足读者理解需求（功能导向）[15]。这种“策略连续体”现象表明，翻译的本质是功能导向的动态调适，而非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

5.2 研究不足与未来方向

既有研究虽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未突破关键理论瓶颈。首先，多模态文本的覆盖范围是有限的，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字幕翻译、游戏本地化等传统场景，而对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及元宇宙等新兴领域的探索尚未形成体系。例如在 AR 医疗设备说明书的翻译中，不仅要求文字精准，还需协调视觉、听觉与触觉的同步性，但目前诺德模型的应用仍缺乏针对此类场景的系统规则[18]。此外，元宇宙中的虚拟会议翻译需根据文化负载度动态调整策略，如中国茶艺展示需在字幕中音译“Gongfu Tea”并添加悬浮注释，而设备操作指引则可简化为触觉反馈（如手柄震动提示），但相关研究仍处于概念阶段[19]。当前诺德模型与人工智能的技术整合路径仍有待探索。尽管大语言模型（如 GPT-4）已具备基础

术语识别能力，但对文本功能属性的判断精度仍存在显著不足。例如在分析“傩面”相关文本时，模型可能误判其功能为“民俗服饰说明”，而忽略其作为文化符号的深层意义，导致策略推荐偏向工具型简化而非文献型注释[20]。这种误判源于 AI 对语境和交际意图的理解局限于表层语义，难以捕捉文化专有项的多维内涵。

针对上述不足，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突破。在技术驱动的功能识别领域，可研发智能化策略适配系统，实现功能需求与翻译策略的精准对接。以法律翻译为例，当输入文本关键词“exclusive right”及语境参数“中荷种子法对比”时，系统可自动调用法律术语库匹配“专有权”，检测其在中国《民法典》中的适用范围，并推荐“术语静态对等+效力注释”策略，同时关联《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相关条款以提示司法歧义风险[10]。此类工具需整合机器学习与专家规则库，通过案例训练提升 AI 对“文化负载度”“法律效力偏差”等核心参数的识别精度。在译者能力培养层面，需协调技术效率与专业判断力的辩证关系。例如可先利用 AI 辅助系统快速生成术语注释草稿，如输入“傩面”后，系统基于《中国傩戏史》[14]和《原神》世界观设定集输出注释初稿：“中国古傩仪中的驱邪面具，璃月地区将其改造为庆典道具”，译者可根据此调整文化阐释深度[7]。同时，法律翻译中可引入效力偏离预警器，当术语匹配度低于阈值时触发提示，如“专有权”在目标语境中的效力覆盖度不足 60%时，建议补充知识产权条款脚注[10]。然而，需警惕技术依赖风险——若译者过度依赖 AI 的功能识别，可能忽视方言诗词的音韵功能或特定场景的交际特殊性，导致策略机械化。

当前跨学科翻译研究在多模态文本覆盖与技术融合层面仍存在显著局限。新兴领域的多模态协同规则尚未完善，AI 技术对文化深意的识别能力亦有待提升。未来需着力构建智能化策略系统，优化功能识别与动态决策机制，同时强化译者的主体判断力，在技术赋能与人文洞察间寻求平衡。唯有兼顾效率与深度，方能在技术浪潮中守护文化精粹，推动翻译实践在精准性与适配性上的双重突破。

参考文献

- [1] 吴丽竹. 诺德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三省坡密码》（节选）汉英翻译实践报告[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24.
- [2] Nord C.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M]. Amsterdam: Rodopi, 2005.
- [3] Vermeer H J.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A]. In: Venuti L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 London: Routledge, 2000: 221-232.
- [4] 刘若琦. 诺德文本分析模式下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The Food Security of the Future（节选）汉译实践报告[D]. 大连: 大连海洋大学, 2024.
- [5] 彭潍坊. 诺德文本分析模式指导下商务文本汉英翻译实践报告[D]. 西安: 西安理工大学, 2024.
- [6] 张子杨. 诺德文本分析模式指导下的药品说明书英译汉实践报告[D]. 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24.
- [7] 初柏辰. 诺德文本分析模式指导下的游戏本地化翻译——以《原神》为例[J]. 英语广场, 2024(1):27-30.
- [8] 李华. 《喷煤系统操作和维护手册》（节选）英汉翻译实践报告[D]. 石家庄: 河北科技大学, 2023.
- [9] 唐嘉欣.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节选）字幕汉英翻译实践报告[D].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 2023.
- [10] 李金莲. Seeds And Planting Materials Act（2005）（节选）英汉翻译实践报告[D]. 武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3.
- [11] 李彤彤. 克里斯蒂安·诺德文本分析模式视角下的机械专利说明书汉译实践报告[D]. 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23.
- [12] 吕芳. 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23.
- [13] Toury G.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Malfunction"[J]. Target, 1995(2): 215-241.
- [14] 陈明. 增强现实医疗设备的多模态翻译研究[J]. 中国科技翻译, 2023(4):12-15.
- [15] 王磊. 大语言模型在翻译功能识别中的局限与对策[J]. 外语电化教学, 2024(2):45-49.

-
- [16] 张悦. 元宇宙场景中的多模态翻译模型构建[C]//2024 年国际翻译技术大会论文集.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4:134-140.
- [17] 周学梅. 基于诺德文本分析方法的《中国日报》新闻翻译实践报告[D].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2023.
- [18]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0.
- [19] 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机械工程技术语 第 1 部分:通用术语:GB/T 3935.1-2023[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23.
- [20] 殷可. 『学制百二十年史』中术语的翻译[D]. 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23.
- [21] 安昕苒. 《批判性思维的力量》(第一章)翻译实践报告[D]. 重庆: 重庆大学, 2023.